

福建文史資料

(選輯)

第一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福建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編輯室編

福建文史資料

(选 輯)

第 一 輯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

文史資料編輯室編

福建文史資料

(选輯)

第一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資料編輯室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福州得貴巷18号) 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001号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耗 1/32 印張6 1/16 字数144千 印数1,501—5,900
1962年11月第1版 1964年5月第2次印刷

統一书号: 11104·10 定价: (6)0.60元

出 刊 說 明

一、本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国委员会周恩来主席对各方面老年人士所号召的“把亲身經歷紀錄下来傳之后代”的精神，在党的正确领导、各有关方面的大力协助和各界人士热烈响应下，广泛地开展了征集文史資料工作。为了更好地保存和积累本省文史資料，并进一步推动撰稿工作的开展，我們特刊印《福建文史資料（选輯）》（以下簡称“选輯”）。

二、“选輯”所选的資料，大都是撰写者亲身經歷和見聞，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的，但由于每个人所見所聞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可能不尽翔实，观点也可能不完全正确，因此，“选輯”只作为不定期的刊物在内部发行，并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三、“选輯”所选的資料，包括从清末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各个时期的軍事、政治、經濟、文教、华侨、民族、宗教、社会风尚、历史人物等各个方面，不拘观点，不求完整，不限体裁，但要求資料具体、真实、有一定史料价值。

四、“选輯”所刊載的資料，欢迎閱者提出补充和訂正的意见和材料。

五、“选輯”对来稿可加以綜合、选录、删节和作文字上的修改。

六、来件除視参考价值大小发給資料費外，凡被采用刊登于“选輯”的稿件，另再酌給一定的稿酬。

目 录

“福建人民政府”和“生产人民党”断片.....	何公敢(1)
我所想起的关于“閩变”的几件事.....	陈碧笙(22)
我在旧海军亲历记.....	李世甲(36)
海軍上海領袖处与三都支应局杂忆.....	張日章(69)
楊砥中之死.....	林猷炘(75)
馬尾海軍鑄币厂.....	陈寿綏(80)
福建地方派系的倾轧与“一六事件”始末.....	許显时(84)
有关福建地方派系及“一六事件”側記.....	何公敢(99)
关于“一六事件”的几点补充.....	吳舟孙(102)
許崇智响应“二次革命”点滴.....	郑 坦(104)
建国軍和建国制置府的曇花一現.....	潘守正(111)
闽江私营轮船业小史.....	吳高榮(117)
福州开辟为通商口岸早期的情况	
(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的供状)	
.....	(英)卫京生(wilkinson)作
刘 玉 蒼 譯	(137)
“仁慈堂”虐杀婴儿案記实.....	林翰英(167)
有关“仁慈堂”案的补充.....	郭肇民(169)

附 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

研究委員會兩年工作總結報告……………(17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福建省委員會

征集文史資料參考題目(草稿)……………(183)

“福建人民政府”和“生产人民党”断片

何 公 敢

“福建人民政府”的酝酿和成立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早晨，福州南較場（即今省人民体育场）聚集了许多十九路军的官兵和群众，在演讲台上，数十百人三五成群地相互交谈着，忽然瞥见蔡廷锴站在台中央，拿出一幅红、蓝、黄各色的布旗，大家视线集中了。在掌声和鞭炮声中，这幅簇新的旗帜徐徐地升上旗杆的顶端，随而大会宣布了“反蒋抗日”，这标志着“福建人民政府”——“闽变”的序幕揭开了。

翌日，各省代表公推李济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徐谦、黄琪翔、李章达、何公敢等九人为中央委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这一事变是经过多年酝酿的。在一九三三年以前的两三年间，我曾数度到沪，遇见陈铭枢，彼此觉得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日寇鲸吞中国的野心，可谓昭然若揭；蒋要一手反共，一手抗日，显然不合时宜；中共方面已有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表示；全国人民在“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这一老话指导下，也敌愾同仇，万众一心；蒋固执“先安内、后攘外”的做法，只是为维持其个人法西斯的统治，非推翻他不能救亡。

陈先后谈到：他曾派人和中共联络。初由梅龔彬、刘叔模、

刘伯垂向在沪的秦邦宪、王明同志提出十九路軍与中共合作倒蔣抗日的建議，沒有結果；继請陈公培到黎川找彭德怀同志，由彭电告毛主席，得到贊同，乃派徐名鴻往瑞金，訂定了軍事协定；又有两粵和各省也在接洽中等語。（后来据傅柏翠說：閩西善后处和中共另有一个关于商业协定）再就十九路軍將領和蔣的关系來說，也早已貌合神离了。如陈銘枢在南京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时，曾反对蔣集党、政、軍三方面大权于一身的做法，写了很长的一封信給蔣（这封信是彭一湖給我看过的），要求蔣只任一端，信內引用了“蔣家天下陈家党”一語，对蔣抨击頗烈。信发后，陈即辞职赴沪，托病进医院；后来胡汉民派人到沪劝陈返南京，才回南京同蔣随軍攻徐州；失敗后，均离宁。又如，蔣光鼐率軍攻山东张宗昌，迫近济南时，济南內外乱成一片，城即日可下，詎料蔣介石来电，命候三日，待蔣軍某部达到，方准入城，但历一日又半，十九路軍官兵譁然，便不顾蔣的电令，率部进攻，城立陷。时张宗昌新购枪炮一大批，均装在运貨列車中，軍潰，仓皇逃走，因列車过长，断弃了后半，全部为十九路軍所卤获。虽經电告蔣介石后，遵蔣令移交某部，然彼时十九路軍枪械破烂残缺，众均望能分得若干补充，不料蔣竟連一支枪、一粒弹都不給，因此，全軍大失所望。南下后，蔣光鼐遂托辞返沪养病，到“一·二八”淞沪抗日事起，才出任总指揮。抗战二十七天后，蔣介石亲自打电话找蔣光鼐，一开口便說：“你們打二十七天了，打够了，可以停战了。”蔣光鼐答：“老百姓不肯停战。”蔣介石說：“甚么是老百姓？”砰的一声，便把电话挂断。淞沪抗日时，十九路軍一团伤病官兵退到南京，向蔣介石請求医药和給养，蔣說：“是陈銘枢叫你們打的，你們可向陈銘枢索取。”

十九路軍餉糈，听說月需八十万元，蔣介石只給二十五万元，

余数是由陈济棠在广州的“河南賭捐”中，月拨三十万元，另由宋子文月給蔡十万元等收入凑发。当十九路軍奉命入閩及組織省政府时，蔣光鼐暗中曾和大家約明以“反蔣”为条件，才接受省主席职务。到閩后，他复以此面告方声涛和我，并約我們兩人同他合作。（方声涛曾对我說，他原想举事后十九路軍出省作战，福建后方由陈国輝和其他各部防卫，后陈为十九路軍所杀，方便离閩。福建举事后，蔣介石在汉口找方，排了鴉片舖向其求教。）

陈銘枢曾同李济琛（李曾无缘无故被蔣介石押禁西山多时，他对蔣的感情不待說了）、黃紹竑共議另組政党，訂有合約，并希望胡汉民入粵主持。陈又和陈济棠、李宗仁談反蔣企图，陈济棠答复模稜其詞；李宗仁則坚决表示反蔣，曾有福建支撑两个月后桂方加入的諾言。

在国民党元老中，李济琛約好了馮玉祥和徐謙。李济琛、陈銘枢同訪过陈友仁，由甘介侯翻譯，談了四次，李虽不曾发言，但始終咪咪笑地旁坐着，結果陈友仁也同意入閩。

“何梅协定”在酝酿时，李、陈、蔣、蔡曾联名电蔣介石表示反对，蔣置之不理。

一九三三年上半年，陈曾到閩，一日清早，来朱紫坊我家，我从梦中被唤醒，陈要我約在閩諸友（指孤軍社同人中曾参加南京政治部和广东省政府的）来談。当約了阮湘、李际閩、杜国兴、林式增、罗超彦等到我家。陈宣布他和蔣光鼐、蔡廷鍇已于昨日决定了就閩起事，联共、倒蔣、抗日，請大家早作准备。不久，陈又赴港。

过一些时，林植夫由南京回閩，表示反对，彼此爭論不决，我和植夫决定同往香港訪陈一談。我們俩赴港晤陈，陈說两粵已同意，他省也都有了布置，并請胡汉民到粵主持。此事若成，便是閩粵联合，将以广州为中心来举事。

就陈还想邀请胡汉民入粤主持一点来看，可知陈那时尚在拥胡倒蒋，并无后来所谓“毁党叛团”（胡汉民通电中的话）的意思。后陈两度邀胡入粤，胡高坐“妙高台”（香港胡住宅所在）不肯动。同时黄琪翔由沪到港，传宋庆龄语：“国民党天怒人怨，必须抛弃，果能若是，她将来也可参加”等语。因此，陈遂决定抛弃拥胡这一着。

“生产人民党”的成立和“福建人民政府”

各方面杂记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会成立的那天（十一月二十二日）早上，福州南大街全部商店，都挂了新旗，一片簇新旗帜，光彩夺目；但全市喧传，警察厅每一面旗，收了一块钱，措了一大笔油。我和林植夫听了大愤，便驰往“人民政府”告诉陈铭枢，撤了丘兆琛的职，改派丘国珍为警察厅长。

中委会下面设军事、文化、经济三个委员会，和财政、外交两部，一院，一局。军委会由李济琛主持，文委会由陈铭枢主持。陈在组成“生产人民党”后担任党的主席，事实上是把文委会代替了党，主持文化工作和群众运动。蒋光鼐主持经委会兼财政部，陈友仁主持外交，徐谦主持最高法院，李章达主持保密局（秘密的）。

中委会后来增加了方振武、戴戟两位，方未来闽，暂秘不发表；戴参加了，但他对我谈，福建如搞土改等做法，他全不理解，无法参加，不久他便先去沪了。

举事后不久，某日，陈铭枢感冒卧床，我去看他，陈说：“第三党在十九路军中有活动，有发展，我们这些人已经放弃了国民党，现在却无组织，处境不利，我们另行组党如何？”我表示同意。后由陈委托他所主持的文委会中人起草了“生产人民党

党綱”（那时梅龔彬担任文委会秘书长），并征集大家加入。在（拍了照的）当时签名单的一段中，有許錫清、陈友仁、李章达、蔡廷鍇、胡秋原、沈光汉、毛維寿、譚启秀、张炎、徐名鴻、钟喜焯、黃艮庸、罗长海、梅龔彬、蔣光鼐、李济琛、戴戟、程希孟、林崇墉、陈公培、区寿年、何公敢、陈銘枢、林一元、魏育怀、譚冬菁、林植夫（签名单拍照至此止，当失敗时，原单全部埋藏于龙岩某地土中，解放后取出，存林植夫处被遺失了）。这签名单上，虽无第三党人，但我記得当时某日，亲見黃琪翔帶領了很多第三党人員往密室中签名，并在福州报纸（那时办有《人民日报》）上声明解散第三党。

馬來亞、日里（即印度尼西亚的棉兰）、越南等地华侨多人来榕，都参加了“生产人民党”，当时海外的致公党，也是表示拥护“人民政府”的。

“人民政府”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发表了第二次宣言，提到“生产人民”四字的意义，便是“生产人民党”的主张。（其实在当时只是一种标榜，思想上和在行动上距离很远。）

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时，徐謙老先生主张，一切議决案，应全体一致才作出决議（某人有異議时載入記錄），很細致地作了規定。陈友仁先生通过程希孟的翻譯，非常认真地傾听一切。會議統由李济琛主持，各委都严肃地准时出席。馮玉祥派了余心清来閩代表他，提出了提倡节俭一案，大家一律換穿了蓝布的苏維埃式制服。

起初在中央各部、会下，只有一个“福建省人民政府”，派我負責。我們本着節約旨趣，只設科，不設厅，把原有各厅机关房屋，都騰供中央各部会使用，原有各厅人員裁減三分之二，档案等件一律并存原省政府中，却也容納得下。阮湘担任了副省长，李搏負責財政，李际閭負責教育，刘聘业負責建設，林崇墉負責

土地科，林植夫負責省公路局，江伯訓負責省水利局，陈碧笙負責福州稅務局。到十二月十二日，把福建改划为閩海、兴泉、汀漳、延建四省，閩海省仍由我和阮湘担任正副省長；兴泉省由戴戟、陈公培負責；汀漳省由許友超、徐名鴻負責；延建省由薩鼎銘、郭冠杰負責。

薩鼎銘在南較場开会后，來訪我，我告以“倒蔣抗日”旨趣，薩極贊同。他在中委会就職典礼上作了演說，盛贊上紅下藍二橫条、中嵌五角黃星的新旗幟的絢麗，比国民党的旗幟好看得多。分四省后，他老人家本拟即赴南平，后聞和郭冠杰意見有些相左，四省原定新元二年元旦成立，屆時，閩北已战云密布，因此，延建省流产，薩未就任。（失敗后，十九路軍經福州退却，市井不惊，薩在商会里，大写“十九路軍軍紀古今无双”的标語，直到蔣介石軍入城，才徒步由北門离开。）

会中决定以蔡廷鍇兼任第一方面軍总司令，一軍沈光汉、二軍毛維寿、三軍区寿年，四軍譚启秀、五軍張炎，赵一肩第一独立师，翁照垣收編陈国輝旧部洪文德、陈佩玉等，称人民自卫軍。各軍、师长发表后，各軍多請客，夜夜有宴会，忙不暇接，大有不是革命而是宴会之感。这一現象，直到大家各回防地后才消失。

举事后，中委会派尹时中代表我們，往駐瑞金。（后来尹曾对我說，他在瑞金曾列席中共中央某一大會，会中有人提出，应当援助福建的話，但主席团宣布福建也是軍閥，便打銷了。）中共方面，也派了潘汉年和軍事代表張云逸駐福州联系。那时中共缺乏盐斤和雜貨，我們这边大量供給，以换取他們的粮食。这样在心理上我們以为已經和紅軍訂了合作的协定，在閩西、閩北有紅軍作屏蔽，打算把各駐地的軍隊集中起来，加以整理扩充，然后再与紅軍商定进攻大計，而且在这一方針下，已有了行

动。

一日，北京《晨报》社的陈博生（溥賢）闖入“福建人民政府”，大叫大嚷地說：“这一举，是十多年来最痛快的事！”

（那时，他办北京《晨报》，是张学良支持的。）他說：“他代表张学良来閩，张极贊成此举，决定即离法回国，不久可到。”（我們失敗后到香港不久，港报載张学良搭某輪过港回国。）

湘人王近扶病来閩說，湘西陈渠珍部分，他已經接头好，准备响应；东北派了王凤岐为代表来福州；樊鍾秀的代表，在广东和陈銘枢見面接头了；四川各部分的代表，在香港也都接头了，但他們都是看風使舵的。

关于群众运动，在文化委员会，本有此种企图，但除在閩西龙岩由傅柏翠、徐名鴻等，做了一些农民运动，实行計口授田外，又在漳平，有华侨陈文成在坚拒中共进入后，反而感到分田的合理，实行了永福一区内的分田。福建举事后，我在福州只参加过一次在福建学院內召开的妇女会，到了妇女六七百人。这是在学院学生指导員杜国兴（周南）的启发下，由女学生岑淑卿、林琼等发起，得到李忆兰（当时隐藏在学院中的中共黨員）、林舜玉等协助，在短期运动中成立的。会后并从事妇女識字运动。

关于“土改”問題，据当时总参謀长邓世增（益能）对我說，十九路軍的官兵是贊成分田的，因为十九路軍在江西参加“围剿”时，地方农民都是中共的耳目，而“围剿”軍却是瞎摸暗索，作战必然失敗。因此，他們从切身經驗中，承认有必要分田，以便和农民打成一片，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有利于作战。当时在“人民政府文化委员会”中，某些人主张福建全省立即实行“土改”。我反对立刻全部实行的做法，认为必須从一二地点先予試

行，取得經驗后再行推广。后决定在閩西和閩东連江县先行試驗，閩西由徐名鴻担任，閩东由我担任。我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同連江县长张善和土地科长林崇墉及文委会一些人同往連江，蔡廷鍇派了一营軍隊归我指揮，一同前往，事前听說連江某地有中共发动群众拆毀田塋，插牌分田，連江江南面地主們人心惶惶，当即派人向連江中共方面接洽，据复称，中共方面的負責人說，如“人民政府”实行分田，他們当让“人民政府”去做。我要求和这位中共领导人見面，他不肯来省。我到連江后，召集县城群众宣布了計口授田。当时地主們都在会場旁听，听到宣布分田，自然失望；但聞我說只分田地、农具、耕畜，其他浮財不分，地主們表示，一样是分田，宁可由“人民政府”来分。我們前往連江时，听說城郊附近的共产党都往連江外海去了，又查外海馬鼻乡地主最多最强，分田試驗便决定先从馬鼻下手。但在分田人員和軍隊整队出发的翌日，便接到蔡廷鍇专人送来的信說：“閩北方面，敌人窜入，防务紧张，一营人須即調回。”大局所关，当即派专人把分田人員和队伍調回，事遂中止。我也于二十八日早返省。

在閩举事，日本帝国主义是很注意的，尤其关心我們和中共的关系。日本駐閩領事，当时仍在福州。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福州日本領事某忽来電話說，台灣总督府秘书长某，及陸軍武官某和海軍武官某等三人，要来找我。我說一切外交关系統由外交部陈友仁部长主持，我不愿和他們見面。但該領事糾纏不已，經我数次拒絕，他說那位秘书长是当我赴台灣調查农业时和我認識的，想以私人資格来晤見一面，仅限他們二人，別人不来，我答应了。但相見时还是四人，陆、海軍武官也跟着来。我怫然不悅，他們道了歉乃开始談話。起初这个秘书长和陆、海軍武官說，福建和日本在国际关系上有特殊关系，福建有所动作，日本不能不

关心等語。語涉威胁，我严詞峻拒，請他們向外交部接洽。以后，他們轉了話头，詢問“人民政府”和中共的关系，我說中共是中共，我們是我們，但同是中国人，当然有关系，至于关系如何，一凭你們推測。他們乃抓住我們实行土改，說这就是实行中共的主张。我說，我們是主张計口授田的，这是因为农民有这种要求，不但中国有此必要，日本也有此必要。跟着，我便专就日本政友会是地主联合的政党，农村困苦异常，債台高筑，抵押女儿为妓等來說，証明日本也有“土改”必要，并征求他們的意見。他們覺得所答非所問，便辞走了。

一九三三年未举事前，我同林植夫到香港时，陈銘枢問我，将来举事，标榜馬列主义，何如？我表示贊同。（彼此实在都未真正認識）那时見陈桌上有日本版河上肇著的《馬克思主义經濟学》，书中日本俗語，不知何人都逐字譯成汉語，以便閱讀。到蔣光鼐处，見他正在读唯物史觀一类的书，他說陈銘枢要十九路軍將領都读这类书。后来，在閩西举办軍官訓練班，讲授了辯証唯物主义并用里昂节夫的《政治經濟学》作为課本。

我認識李济琛多年，始終不曾听见他发表过长篇大論的話。某日，“人民政府”办公厅里寂然无人，只我和他两人在大房中对坐，他忽談起社会主义来，我靜坐傾听，他說得条理井然，滔滔不絕，談了很久，使我惊异。

一夜，大家忽聚集一小楼中，专談馬克思主义。陈友仁說：“我不懂馬克思主义。”徐謙說：“我也不懂。”蔡廷鍇問我：“馬克思主义什么样？”我說：“我只知道它是好的，但我还未深入研究。”

“福建人民政府”的失敗

我由連江回省后，听說南平已陷。（近日我到南平，遇見紀

廷洪老先生，他說，當時他在南平，南平城前面有九峰山——他邀我望見了，一向傳說“不得九峰不能取南平，失了九峰便沒有南平”，原先十九路軍在九峰山設有炮位，被數倍的蔣軍四面包圍夺取了。南平城守軍兩團被圍困十餘天，激戰只有四十八小時，便撤退了。）趙一肩和司徒非在古田抵抗蔣軍，也失敗了。

某日（可能是一月十日），我到半野軒，蔡廷鍇對我說，要在福州周圍拒敵；我說“很好”。少頃，蔡和陳銘樞、蔣光鼐同往白沙前綫視察，許錫清、黃艮庸等隨同前往。他們從白沙回來時，我聽說在白沙會談中，起初談了很多，後來蔡廷鍇發問：

“現在，誰是總司令？”聞此一語後，大家默然（後來陳銘樞對我說，白沙會談時，蔣光鼐沒有說話），便退回福州。隨着便決定先退往泉州。李濟琛、陳銘樞、蔣光鼐、黃琪翔乘飛機先往。那時蔣介石飛機也在福州低飛投彈，省府大禮堂中了一彈，穿瓦入地數分，却是生鏽的沒有爆發。我和阮湘、李際閻、林植夫等決定渡烏龍江南下。蔣機在峽兜渡口低飛掃射，我到峽兜時，見十九路軍一士兵，軍衣帽甚整潔，眼中一彈，僵臥路旁，我感觸甚深，這一印象至今如在目前。那時渡口擠滿了官兵，數艘小輪往來載運，不知運到何時才了。華振中帶了參謀團一些人和李、陳、蔣的護兵們，也都在待渡。我向福建鹽務機關找到了小火輪，乃得同華等渡江。徒步前行中，過一地方見有大汽車多輛，但都貼有某部封條，兵士中有一人登上了車，另一人大聲喊道“紀律”，已登的便退下。我們到達宏路時，天已大黑，只得借民房一宿。是晚黃艮庸坐了李濟琛的汽車，也到達宏路，說福清縣長黃仁光處有大汽車兩輛，陳銘樞囑他送我們一批人赴泉。翌日，我由宏路先乘車馳往福清縣城一查，黃仁光早把家眷戚友和行李等載滿兩車揚長而去了，我便和黃艮庸同車前往莆田，到莆，入縣署一看，門戶洞開，署中許多人見我們來，都莫名其妙地

站着，据一小孩子說，他知道县长避在某处，可同我前往。我觉察到同行的黄先生已不知何往了，便也退出，見东边墙上有一小門，很多人一齐用力压住門板，而里面也有人想推开門板冲出来，在內外互相抵拒中，不时漏出一二人，我猜是监犯們正在图謀越獄，整个局面在无言中很紧张。我們又乘車走了一段，一队不知属于何方的軍隊，散开拦住大路，据說要找邓世增参謀长，看我不象，便也只好放行。

到泉州后，見陈公培危坐兴泉省府办公厅中，还在守着崗位，聞李、陈、蔣等到泉州时，翁照垣对仓卒撤退大不以为然，大鬧了一下。

由泉州同李、陈、蔣、黄及华振中等步行赴漳，由于沿途电杆、桥梁多被地方土匪破坏，汽車不能走。步行到了漳州角美乡，徐名鴻带了一些队伍，吹号列队迎接，被招待在一小楼上，包、面、飯、菜吃了一飽。

到了漳州，松了一口气。翌日，阮湘、林植夫由泉州乘机也来了，記得亦只住一宿。次日华振中約我和林植夫、阮湘同去吃飯，酒半，他接了一封信，看完后說，率性让你们們吃个痛快后再談罢。我們也不問其所以然地尽情吃喝。餐后，华說：“厦門已丟，（漳厦警备司令是前十九路軍参謀长黄强，我們举事时，原厦門警备司令林向今和黄强妥协了。这一下，蔣軍攻厦，黄强便也和林向今投敌了。）蔣軍已在嵩屿登陆，望漳州前进了。大家都在等你們三人随队出发。”我們便赶快奔回住所，各人都已整装待发，但我們三人身边都不名一文。我們由福州带来了一些款項，到漳即統交給陈銘枢，陈嘱交徐名鴻。于是急奔徐名鴻家，他打开木箱，所有鈔票，經他的爱人分別为一元、五元、十元，一叠一叠地整理好了排在箱中。我們便各伸手随便抓了几叠，尽量往衣袋中塞，塞滿便走。我們坐車到一地，据說前往龙岩适